

「生殖政治的運作機制：生殖科技與母職關連性的研究分析」

國科會專題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 (NSC89-2412-H-002-010 & NSC90-2412-H-002-001)

執行期限：88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吳嘉苓 (clwu@ccms.ntu.edu.tw)

計畫參與人員：研究助理黃于玲 (88 年 8 月 1 日至 89 年 7 月 31 日)

研究助理顧彩璇 (89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一、中英文摘要

這個專題計畫分析人工協助生殖科技過去 50 年在台灣的歷史發展, 探討不孕診療在什麼樣的異性戀父權社會下發展, 新生殖科技又如何可能改變生殖理念與實作, 挑戰生殖分工, 撼動性/別系統。我們發現, 50 年代男性遠生殖的生殖理念, 使得不孕檢查重女輕男; 重視父系傳承的社會價值, 也使當時對於 AID 的討論著重在男權的保障。然而, 在 70 年代開始, 強調男女同步的不孕檢查, 將男性拉近生殖, 而 AID 增高實施比例, 降低「男性的種」的重要性, 造就非父系血親的生殖突破。90 年代, 不孕檢查逐漸破除「生殖=女人」的生殖意識, 但是以 IVF 與 ICSI 為主的助孕科技反而由於「男性不孕, 治療女性」的不孕醫療模式, 強化了女體與生殖的關連性。雖然異性戀夫妻的不孕「治療」愈發以血親為重, 非異性戀婚姻體制的邊緣他者卻在 90 年代開始利用新生殖科技其分離性與生殖的特色, 成為使用科技的新主體。現今醫學凝視的對象也從不孕的器官擴散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醫療助孕的社會儼然來臨。本文強調, 著重新殖科技多重使用的歷史脈絡與意義轉換, 以及掌握性/別與生殖關係的多樣性, 才能明辨新生殖科技與性/別系統的變動關係。

關鍵詞：新生殖科技、性別、不孕、母職

Abstract

By means of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NRT) in Taiwan since 1950s, I demonstrate how the heterosexual patriarchy shapes the medical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and how the NRT could transform the sex/gender system. In the 1950s, the reproductive ideologies that equated women with procreation exempted men from infertility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In the 70s, the emphasis on the couple as a unit for infertility exam, as well as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using donors' semen, challenged the orthodoxy of husbands' lineage. However in the 90s, while the voice of "men first" in the infertility exam further linked men with reproduction, as the NRT advanced, women had to experience more and more intrusive medical intervention. Particularly,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in-vitro fertilization and ICSI, fertile women with their infertile male partners often had to undergo more medical intrusion. While the heterosexual couples tended to apply the NRT to the attainment of biological parenthoo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RT that separate heterosexual sex from procreation led single women

and lesbians to use the NRT to have their own children. Also in the 90s, the medical gaze extended from the infertile bodies to various dimensions of social lives, thus implying the birth of a society of medicalized conception. This paper stresses that only by see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and diverse uses of the NRT,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the sex/gender system, could we reveal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NRT and the society.

Keywords: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gender, infertility, reproduction, motherhood

二、計畫源由與目的

有關再生產 (reproduction) 的分析討論中, 生殖這個議題, 由於其強烈的生物性, 比家務勞動、養育等等其他再生產面向, 面臨更大的理論化挑戰(Jaggar [1983]1988)。「造人」這件事 (包括受孕、懷孕、生產等生殖過程), 在人類歷史上, 一直是由女性擔任要角。女性懷胎十月, 歷經產痛 (或經由手術), 完成「造人」的勞動; 男性除了貢獻精子之外, 參與十分有限。固然社會學、人類學、歷史與文化研究對於女性的懷孕、分娩經驗, 紛紛以「權力」為切入點, 將看似生理決定的現象, 展現其豐富的社會性, 但是「造人」的分工議題, 似乎因為生理生殖機能的男女差異, 少能有歷史社會變異的分析。女性主義文獻多以「生殖是詛咒? 恩賜?」這類的角度作爭論 (見 Tong 1989 的文獻整理), 也等於是基於女性單一擔任生殖工作的假設。當女性主義者強調家務勞動、育兒等等再生產過程因為性/別系統 (以及資本主義體系、種族關係等等) 才衍生特定的性別分工模式 (例如, Jackson 1992; Glenn 1992), 生殖由於生理限制, 仍透過異性戀性行為來由女性擔任, 使得過去女性主義者少能在「分工」上起論戰, 而多從「差異」上來做文章 (Jaggar [1990]1994)。

人工協助生殖科技 -- 本文有時稱為「助孕科技」、或是「新生殖科技」(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 逐漸廣泛的運用, 似乎都更戲劇性地凸顯「生殖的生物決定性」論述的不足, 進一步地把生殖上的 (異性戀) 性別分工, 予以複雜化; 用 Franklin (1998: 103) 的話來說, 對於過去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如親屬、生殖、父/母職等, 新生殖科技開發了「去理所當然化的角度」(defamiliarizing lens), 讓我們對相關文獻予以重新檢視。例如, 藉由人工受精, 體外受精, 甚至體外受孕, 「造人」的性別分工在人類史上第一次出現變異, 未必全程由 (單一) 女性擔任; 基因的、妊娠的、與社會的親職也前所未有地出現了分離的可能性; 新生殖科技將性與生殖分開的特色, 也使得透過異性戀性交而生殖, 不再成為唯一可能的生殖模式。於是我們要問, 助孕科技的出現, 如何改變性/別系統? 人工協助生殖科技, 又是在什麼樣的性/別系統下發展? Jaggar ([1983]1988) 所提的女性主義討論的核心關懷, 「(如何) 將生育視為一歷史過程, 而這歷史過程是由人類的生殖生理, 與社會組織的形式, 兩者不斷辯證的關係所形塑」(頁 76), 就在「造人」出現了新的模式後, 有了更多探索的線索。

本計畫藉由台灣助孕科技發展的歷史調查, 來探究人工協助生殖科技與性別社會的關係。這樣以台灣社會為研究對象, 一方面特別顧及不同科技的異質性與科技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也掌握性/別系統的變動, 而非僅將異性戀女性作為助孕科技唯一的使用者。我們要問, 台灣的不孕診療, 在一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是如何形塑的? 有可能因為其醫學知識與科技本身所造成對生殖理念與實作的改變, 而撼動什麼性別邏輯、挑戰什麼生殖分工嗎? 我們以台灣醫療制度中

不孕檢查與不孕「治療」這兩個面向的發展軌跡，劃分三個時期（1950-1969，1970-1981，1982-2000）來試圖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的資料來源包括醫學期刊、通俗醫療文獻、家庭計畫研究所文獻、報紙醫療新聞，不孕醫療院所的田野觀察，以及醫事人員與不孕者的訪談。¹

三、結果與討論

台灣女性主義有關新生殖科技的討論，多半集中在代理孕母的議題，爭論著新科技是舊父權的幫凶，還是新科技作為身體的新抗爭。然而代孕只是眾多助孕科技的一環。過度集中在代孕，容易忽略新生殖科技的異質性，也難以全面探查新生殖科技彼此迥異的性別政治。像過去英語世界相關文獻「科技是解放或束縛女性」的提問（例如，Strickler 1992；Denny 1994），忽略到科技的異質性與社會的變異性。說「助孕科技反映並形塑性別系統」，固然沒錯，卻也太籠統，未能具體呈現「反映-形塑」的變動過程。

本計畫結果意圖從 1950 年以來新生殖科技的發展，來探查助孕科技與性別社會的關係。就不孕檢查方面（見表一「不孕檢查」一欄），台灣在 1950 年代即開始設立不孕門診，當時的檢查多為女先男後；70 年代逐漸出現「男女同步」的論調；90 年代對於檢查流程，更有「男先女後」的呼籲。就醫界提出理想的不孕檢查流程來看，的確有打破生殖僅攸關女人的刻板印象，拉近男性與不孕的距離。

表一：比較 50、70、90 年代不孕診療的特色

	不孕檢查	不孕「治療」	AID 的變化	科技與社會
50 年代	女性為主	檢查多，治療少 女體為主要治療對象	僅有數例 醫學論述強調男性氣質的損傷	社會 → 科技
70 年代	呼籲 男女同步	生殖知識指導為主 AID、領養遠血親 手術用藥治療身體	使用增多 醫學論述強調避免血親迷思	科技 ↔ 社會
90 年代	呼籲 男先女後 自我懷疑不孕 程度增加	治療身體措施減少 重血親的 VIF、ICSI 取代 半血親的 AID 女體為主要治療對象	異性戀夫妻使用降低，改用 VIF 與 ICSI 女同志、未婚女性使用出現	科技 ≈ Δ 社會

相較於不孕檢查尚逐漸有破除「生殖=女性」的面相，不孕「治療」的發展變化複雜（見表一「不孕『治療』」一欄）。50 年代的不孕診療，檢查意義大於治療；70 年代仍以性知識的傳授為主，但是當時逐步頻繁的 AID，一度淡化血親觀念，降低「傳男性的種」的重要性；90 年代的新科技已使得「治療不孕身體」的作法受忽視，VIF 與 ICSI 都越加將女體視為不孕治療的主體。特別是在男性不孕方面，隨著不孕治療技術的精進，對於女體的侵入反而更深化。早年人工受精開始發展即有如此傾向，當時承受的可能是注射器插入所帶來的副作用，而隨著體外受精的技術越加突破，生殖機能健康的女體，反而因為男方不孕，遭受包括吃藥、取卵、植入等等更具侵入性的醫療措施。

¹ 我們在一所醫學中心婦產科門診進行了五個半天的參與觀察，以及在這家醫學中心的不孕「治療」部門進行了兩個月的田野觀察。有關醫事人員的訪談，包括婦產科醫師、技術員、護理人員、諮詢員等，一共有 14 人。對於異性戀有不孕求診經驗的訪談，共 23 人（其中 4 位為男性）；針對同志對於生殖與親職

AID 使用與意義的變化，特別能顯示助孕科技在不同時代脈絡會產生異質的意義（見表一「AID 的變化」一欄）。雖然 1952 年台大開始使用 AID，可是當時醫學論述都在男性陽剛氣質是否受損（戴綠帽的聯想，非血親的遺憾，取精的尷尬）打轉。在 1980 初期台灣還成立精子銀行，並隨著 AID 的使用人次增多，破除血親迷思的論調也出現。然而到了 90 年代，AID 可能的社會改造，卻遭 IVF 與 ICSI 等其他新生殖科技的取代，轉向重血親的老調。VIF 與 ICSI 需要更女體經歷更繁複的醫療措施，來換得有父系血親的子嗣。雖然 AID 在 90 年代於異性戀夫婦之間式微，卻在同志平權運動與婦女運動日漸蓬勃的社會背景下，成為女同志和單身女性達成生殖欲望的新資源。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若要全面討論助孕科技的社會意涵，必須細究其內在的異質性，以及歷史社會脈絡。例如，不孕檢查的確逐步提高了男性近生殖的觀念，而不孕治療卻可能愈將女性當作治療的主體。助孕科技一度促發打破血親的親屬觀念，又一度強化血親的重要性；一度強化傳承男性種的重要性，一度又讓沒有男性伴侶的女人能夠生殖。這顯示科技的意涵除了不能忽略其本身特質（例如其分離性與生殖的特色），也要看在什麼樣的社會脈絡，影響科技的使用與意義。更重要的是，過去的文獻忽略這些科技彼此之間的取代性 -- 像是這篇論文所探討治療身體的醫療措施如何被不能治療身體的新生殖科技所取代，AID 如何又被 ISCI 所取代等等。而這樣取代的現象，並不完全基於科技的效能（如 ISCI 並未比 AID 的成功率高），更能顯現出助孕科技並無一個內在固定不變的意義。而意義的轉變，固然要看使用者對於生殖科技的意義脈絡，也不能忽略新科技出現所引發出來的社會解讀；唯有同時看見社會也看見科技，才能充分解釋這些變動的來由與衝擊。

最後，本計畫觀察到，科技與社會的關係在不同的時期存在著不同的關係（見表一「科技與社會」一欄）。我們發現，在 50 年代，主要是社會影響科技的使用。當時男性遠生殖的生殖理念，使得不孕檢查重女輕男；重視父系傳承的社會價值，也使 50 年代對於 AID 的討論著重在男權的保障。然而，在 70 年代開始，比較明顯看見科技帶動的社會改變。強調男女同步的不孕檢查，將男性拉近生殖，而 AID 增高實施比例，造就非父系血親的生殖突破。然而從 80 年代中期，科技與社會的關係，不斷地變動、互相滲透。的確此時期新科技有強化舊思想的可能性，但是也產生了非意圖的效果。相較於不孕檢查連結了男體與生殖，不孕治療到了 90 年代，IVF 與 ICSI 不但見不到什麼顛覆傳統生殖分工的作用，反而由於「男性不孕，治療女性」的不孕醫療模式，強化了女體與生殖的關連性。然而，在異性戀夫妻的不孕「治療」愈發以血親為重的同時，非異性戀婚姻體制的邊緣他者，卻利用新生殖科技其分離性與生殖的特色，成為使用科技的新主體，具體提醒社會重新思考有關「什麼是自然」，「什麼是合法生殖」等基本問題。90 年代更具體呈現「科技與社會的聚合體」的面向在於：醫療助孕的社會似乎已然降臨，助孕科技至此成為社會力量的重要一支。醫療助孕的社會一大特色在受孕的醫療化：一方面我們看到民眾越來越自我懷疑不孕，為受孕而求診的比例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助孕科技也逐步擴散運用到性別篩檢、時機選擇、胎數控制、基因篩檢等非關不孕的面向。醫療助孕社會的另一特色在於醫學凝視的擴散；隨著吃喝玩樂都可能造成不孕的說法四處浮現，不孕成因已從一個生理現象，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果我們抽煙、外遇、喝咖啡、穿牛仔褲、坐在電腦前、晚婚、洗溫泉、暴露在戴奧辛的環境中，都可以牽連到不孕議題，那麼助孕科技至此

的經驗與意見，我們訪問了女同志 5 人，男同志 4 人。

已經成為形塑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因為「避免不孕」的法則，儼然就是社會運作邏輯的一環。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執行兩年，成果豐碩。特別是研究助理的積極，使得最後能以合寫論文的方式來計畫的參與。目前初步的成果發表如下：

吳嘉苓，2002，「台灣的新生殖科技與性別政治，1950-200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已接受刊登）。

吳嘉苓、黃于玲，「順從、偷渡、發聲與出走：台灣『病患』的醫療體系參與」，發表於「2000年醫療社會學研討會」，台北：台大社會系。（投稿於《台灣社會學》，目前為修改後再審。）

Chia-Ling Wu. 2001. "Infertility, Stigma and Gender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Gender, Psychology and Culture" Conference, Tamkang University, Taipei, May 25-26, 2001). 此論文預計投稿至 *Gender and Society*。

Chia-Ling Wu. 2001. "The Disappearance of Infertile Men? ICSI, Genetics and Gender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Boston, USA, November 1-4, 2001. (Paper read by Professor Charis Thompson) 此論文預計投稿至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本計畫進行後期，亦發現目前生殖科技與基因科技發展有密切關係。這部份的研究發展潛力，應可以在我目前執行的基因科技國科會計畫進一步的發展。

五、參考文獻

- Denny, Elaine. 1994. "Liberation or Oppression? Radical Feminism and In Vitro Fertiliza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6(1):62-80.
- Franklin, Sarah.. 1998. "Making Miracles: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the Facts of Life." Pp. 102-117 in *Reproducing Reproduction" Kinship, Pow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ds. Sarah Franklin and Helena Ragon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Glenn, Evelyn Nakano. 1992. "From Servitude to Service Work: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in the Radical Division of Paid Reproductive Labo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8(1):1-43.
- Jaggar, Alison M. 1983[1988].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Jackson, Stevi. 1992. "Towards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Housework."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5(2): 153-172.
- Strickler, Jennifer. 1992.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Problem or Solu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4(1):111-132.